

駁斥右派分子楊思正、王士章
在经济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

跃 青 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一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 1
- 二 驳斥“党不懂经济规律”的谬论 17
- 三 妄想否定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劳动价值論 23
- 四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一)妄想修正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論 36
- 五 为资本主义世界粉飾太平——
(二)妄想修正馬列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理論 47
- 六 对“农业合作化太快了”謬論的批判 61
- 七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二种形式及其性质的反动
观点的批判 68

一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

反右斗争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不长的时期中，我国各条战线上都创造出数不尽的奇蹟，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全大跃进，这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地发展，主要是由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而正确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打退了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从而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而无限的前途。

党和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同时，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反动言论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因此，对资产阶级右派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取得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

就在于通过对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的批判，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这些右派謬論的反动性和修正主义的本質，从而有助于消除右派所遺留下來的毒素。

去年，上海財經学院和華东紡織工学院的教师 and 全市政治課教师一道，对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清除了馬列主义理論队伍中的两个敗类。右派分子王士章（原上海財經学院国民經济史教研組教員）、楊思正（原華东紡織工学院政治經济学講師）和全国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由于他們一貫地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乘党整风的机会，披着伪装，打起“招牌”，兴风作浪，顛倒是非，向党猖狂进攻。王士章和右派分子吳承禧一向有密切联系，而楊思正又是王的“知心”密友，平日互相标榜，互通声气。在鳴放开始时，他們估計形势，認為时机对他們有利，要“出头透氣”了，更进一步地勾結起来，对党連放毒箭，詆毀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猖狂地抨击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使資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使資產階級学术思想乘机泛滥。

右派分子进攻的目标，首先就是党的領導。关于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党的領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証，因而是右派分子所深恶痛絕的。王士章、楊思正当然也不例外，他們为了打击党的威信，破坏党群关系，从而使党陷于孤立，极尽挖苦地辱罵党員、团員和靠攏党的积极分子。他們把担任負責工作的党員同志污蔑为“老爷”、“官們”，而把自己称为“老百姓”；还把党团員譏刺为“特权階級”和“运动員”，而把积极分子說成是“应声虫”和“保皇党”。他們的阴谋，

显然是企图把党员和国家的干部与群众对立起来，并曲解成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借以混淆视听，分裂党群关系，破坏团结，以达到他们反党的罪恶目的。

他们对党选拔干部所一贯遵循的德才兼备而以德为统帅的原则，进行了恶毒的诋毁，他肆口漫骂说：“对党员无才便是德，”对他们自己来说，“有才便是德”；并且叫嚣说，他们是“大才小用了”。

谁都知道，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除了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严肃地工作以外，并无任何私心。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党的全部主要骨干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前仆后继，坚贞不屈，其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许多人所难以想象的。可是右派分子却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拿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官们”的丑恶头衔，强加在党员干部的头上，这完全是一种恶毒无赖的行为。道理是显明的，因为党团员和党的干部是具体贯彻党的领导意图和执行党的政策的，而积极分子又是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此，右派分子总是从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入手，来动摇党的领导。

我们所选拔的干部，是作为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驯服工具，注意政治条件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就要犯重大的错误。对于阶级敌人来说，这当然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们所谓的“大才”，实际是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当作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驯服工具，那简直是笑话了。

这还不算，王士章、杨思正的反对党的领导，更赤裸裸地

表現在“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丘八不能領導丘九”等謬論上。他們在鳴放中大肆宣揚“民主辦校”和“教授治校”的邪說，並且認為只有“教授有高度科學文化水平，才能辦好學校”。他們一方面詆毀黨委領導下的高等學校不“民主”，另一方面污蔑“黨員不懂業務，不能領導高等學校”。他們的陰謀，顯然是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教授”、“專家”，來代替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對科學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他們污蔑“現在的社會科學水平不高，是由於黨管的太緊，妨礙了思想”；又說“馬列主義窒息了科學研究”；因而竟異想天開地提出“科學應當開辟自由市場”等謬論，借以取消黨對科學方面的領導，使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泛濫橫流。

我們認為，文教科學要不要黨的領導，並不是一般的學術爭論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政治方向和路線的鬥爭。我們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沒有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教育是不能設想的。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殘余服務，為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和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服務。因此，一切教育行政機關和一切學校，應當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資產階級的“教授”、“專家”是沒有資格來領導這樣的教育事業的。我們的科學，無論是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是服從於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科學，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原則的科學，而對於那些反動的、腐朽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必須進行徹底地揭發

批判。这当然也不能讓資產階級的“內行”人來領導。事實上，幾年來我國的文教科學事業，正是由於黨的正確領導，走群眾路線，才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局面。右派分子的反黨的這塊“招牌”，完全被事實徹底粉碎了。

右派分子對黨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也加以猛烈攻擊。他們叫囂說黨不尊重知識分子，因此，“當今出不了人才，就是出了人才也不會被重視。”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抬出了“文明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羅斯福和封建王朝中的唐太宗。王士章說，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親自登門拜訪愛因斯坦，在英國，科學家牛頓的威信比女王還高，在英美等“文明國家”里，知識分子受到“尊重”，因此才出現了很多的天才科學家；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能夠禮賢下士，因而出現了諫議大夫魏徵等人。而現在則是“官比知識分子重要”，所以既出現不了“青年科學家”——牛頓，也出現不了“諫議大夫”——魏徵。那就是說，黨和政府埋沒了他們的“人才”，限制了他們的謫言蜚語。因此，他們叫囂要改變知識分子的“地位”。

右派分子羨慕所謂“文明國家”，替反動統治階級吹噓捧場；同時對新中國的一切加以歪曲污蔑，這些本來是不足奇怪的。在反右鬥爭中，已經被我們駁斥得體無完膚。問題是：他們為什麼高喊要改變知識分子的地位？企圖何在？必須予以揭發。

解放以來，黨對知識分子一貫遵行着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地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政治地位方面也起了很大

变化。象党这样的重視知識分子，在历史上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从来找不到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以适应建設发展的需要，党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因此把学术文化推向了新的革命阶段，出現了大跃进的形势。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忠于社会主义的青年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正在大批地成长起来。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也积极向党靠攏，爭取彻底改造自己，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事实俱在，人所共睹。但是右派分子竟歪曲事实，进行污蔑，并叫囂要改变知識分子的地位，这沒有别的，只是要知識分子不接受党的領導，重新騎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恢复“劳心者治人”的地位，做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而已。

王士章、楊思正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提出了“三害”（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謬論。王士章說，我国的行政和管理制度即民主集中制，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存在”决定意識，要根除“三害”，就必须“改革”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整风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楊思正又認為“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強調集中必定使民主受到限制，民主和集中說起来是矛盾的統一，实际上統一不起来。”他們都認為“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因为強調集中，实际形成培养下級对上級的机械服从，明明有意見，由于集中而受到限制”，而“无条件服从上級就是盲从。”

以上只是王士章、楊思正在鳴放中對我們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歪曲污蔑的几个例子。根本的問題是他們都极力反对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也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替腐朽的資本主义各种制度，大事鼓吹。我們都知道，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生产資料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它們是剝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剝削阶级的一种本性。因此，三大主义是旧社会的普遍现象，要鏟除它們就必须首先消灭产生它們的旧制度。正因为这样，所以旧社会的統治阶级从来不敢提出反对三大主义的号召。在新社会中，虽然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是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无关。因为在这里，沒有产生三大主义的經濟原因；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是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相反地，却是鏟除三大主义的有力工具。但是右派分子却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們首先丑化人民民主制度，宣布它的“罪状”；然后就否定它，說什么这样的制度要不得，歪曲地說人民民主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源，这样的結論当然是：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才能消灭三大主义。另外还有一面，那就是，把資本主义烘托出来，請它乘机复辟。这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右派分子把民主和集中绝对对立起来的謬論，更是极端錯誤的。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教导我們：“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統一体的两个

矛盾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們主張的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就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有了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發揮全國人民的政治一致性，才能顯示出全國人民利益是共同的、意志是統一的，才能實現全國高度的統一領導，並且消除過去處在被壓迫地位的時候的“一盤散沙”狀態。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也是維護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如果沒有統一集中的領導，我們就不會取得社會主義事業的輝煌勝利。國家的統一領導，並不排斥地方的主動性；國家機關、企業和學校實行民主集中制，也不會限制群眾的積極性及其民主生活，相反地，它使群眾的倡導精神得到充分發揮，民主生活不斷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通過整風，在國家生活廣大範圍內，已經出現了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因此，憲法第二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這一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絕對不容污蔑或否定的。

右派分子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時，還反對蘇聯。因為

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鋒和堡垒，是第一个冲破了资本主义的鎖鏈并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象一座灯塔，照耀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走向自我解放的革命道路，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前方和后方，这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右派分子所最憎恶的。王士章、楊思正由于厌憎苏联，极力地贬低苏联四十年来建設的偉大成就和所造成的影响，說什么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低的很多。”并且捏造騙人的証据，說“苏联人民平均工資只有 300 卢布，但一斤猪肉就要 30 卢布。”这样的騙人手段，稍有常識的人都不会相信的。苏联不但在发展重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发展輕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色之一。苏联人民不但早已消灭失业现象，他們的平均工資在 1,000 卢布左右，而 12 个卢布就可以买一公斤猪肉。他們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相反的，美国的失业者已超出了六百万人。右派分子的欺騙捏造，一拆即穿。

不但如此，他們对苏联的文化科学事业也濫加詆毀，硬說“苏联文化科学水平不高，只有普及而沒有提高”。并且說“在学术上沒有搞出什么东西，只出了些小冊子”。这些謬言更是荒唐可笑，不值一駁。在东风压倒西风的今天，我們但叫右派先生們抬头看看环绕地球的大福星，談談洲际導彈的制造成功以及其它方面惊人的发明創造，就連他們的崇拜偶像——帝国主义的頭面人物，也不能不望而生畏的說：“文化科学苏联領先了！”那末，这些吠影吠声的右派，还有什么可講的呢？

王士章、楊思正不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并且披着“馬列主义”的外衣，举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一方面宣揚和販賣修正主义，另方面对党的思想基础——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歪曲。他們任意地割裂馬列主义，說什么“馬列主义实际上有三种，第一、馬恩列毛的言論是理論，是馬列主义，个别理論上有出入沒关系；第二、馬恩列毛的一字一句不能抵触，否則就不是馬列主义；第三、不但馬恩列毛的一字一句不能抵触，而且高級首长的言論、人民日报社論也不能抵触。”并且說：“馬恩列的言論是馬列主义，修正主义也是馬列主义”，除此以外，“可以百家爭鳴，斯大林說的話不算。”他們認為“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有出入沒关系，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因此又揚言“对行动中的馬列主义不相信”，而“同意修正主义”。

够了，从以上这些极端反动的謬論，就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阴險恶毒的本質。首先，他們除了抹杀斯大林同志的功績以外，并且用“一字一句不能抵触”来含沙射影地詆毀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从而挑起人們对馬列主义的怀疑，以便动摇党的思想基础。他們极力反对首长的言論和人民日报社論是行动中的馬列主义，企图把有偉大生命力的馬列主义僵化起来，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們知道，党和政府的負責同志的言論和人民日报的社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馬列主义在我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們代表着党的方針政策和路綫，离开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就等于不要革命和全部否定馬列

主义。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們說“人民日报沒看头，是正統派，”我們的理論工作是“跟着党的方針政策兜圈子，缺少創造性”，用来挑起人們对党的方針政策的怀疑和反对。

其次，右派分子揚言“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有出入没关系，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他們所說的可以“有出入”的“个别原理”是指着些什么呢？主要的是：否定馬列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否定馬列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理論；并且明目張胆地抨击馬列主义理論的基石和灵魂——“劳动价值論”，說它只“适用于手工工場时期以前”。因此，他們甚至說“政治經濟学沒有学头，深入下去也沒有什么东西。”王士章、楊思正关于詆毀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的謬論并不止于以上这些。本书已另有专篇文章，作了全面而透徹的駁斥，这里不必多談。但是，对于右派分子提出这些謬論的阴谋目的，必須予以揭发。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馬列主义政治經濟学是一門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摆脱資本主义压榨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揭露了資本主义剝削的实质及其內在的种种矛盾，从而說明資本主义衰亡与社会主义胜利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的必然性。因此，在一百多年以前，当这門偉大的社会科学出现在学术思想領域中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經濟学的实质，便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而好象在阳光照射下的冰雪，开始融解而沒有科学性之可言了。到了現在，资产阶级的經濟

学不但是沒有科学性，并且早已成为极端反科学的东西。但是那些“逐臭之夫”的右派分子，却象苍蝇滚粪丸似的，对它死啃不放，而对科学的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則极力加以歪曲、否定，并詆毀說“很多論点已經过时了。”这沒有別的，只是充分地表现出右派分子对这一門作为馬列主义思想武器的科学，是如何的憎恶和畏惧。他們怕見这門科学放射出的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光芒，感到資产阶级反动理論的破产，因而引起他們从思想深处流露出的厌恶。

从这可以清楚的看出，王士章、楊思正傳播各种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謬論的阴谋目的，正同其他一些右派一样，是企图用修正主义来代替或取消馬列主义，是企图在学术思想領域中，推倒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篡夺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权，而使反动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乘机泛滥。因此，王士章、楊思正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絕不是一个学术思想問題，而道道地地是一个政治問題。

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的現代修正主义“論点”，表现得非常突出。他們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基本原則，誹謗为“教条”，而他們所攻击的最根本的“教条”，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同南斯拉夫領導集团的口吻一样，恶毒地誣蔑无产阶级专政，說它是造成“三害”的根源。他們一方面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說它是“过了时的”，也就是說，目前它对于社会发展已經喪失了意义；另方面詆毀党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和“不懂辯証法”，而他們自己却自称是“百分之九十的馬列主义者”。

右派分子不但从左边来攻击我們，說我們是“教条主义”者，并用来污蔑党、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加以丑化；并且从右边来攻击我們，說我們的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而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陣营則加以美化。他們为了替壟断資本辯护，竟否定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石——劳动价值学說；否定資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否定資本主义社会經濟危机的必然性等。他們的阴谋目的显然是企图模糊无产階級的階級意志，解除无产階級的思想武装，使它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而走向資本主义道路。

我們知道，資产階級破坏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历来不外用两种手段：一种是暴力鎮压；一种是欺騙。現在，在我国广大工人階級掌握政权的形势下，一小撮右派分子当然只能用詭辯的欺騙論点，来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破坏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定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否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取消民主集中制，从而使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复辟。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教导我們說：“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們对右派分子修正主义的“論点”，必須进行毫不調和

的批判。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因而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反映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同垂死的社会力量的尖锐的斗争；对世界范围内来讲，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斗争。我们绝对不容许右派的修正主义遗毒，潜伏在革命的阵营里面。

王士章、楊思正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王士章、楊思正都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家庭，从小就受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教育，这在思想上已经给他们扎下了反动的根子。王士章十二、三岁时就欣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中学读书时作文常用“希特勒万岁”为歌颂口号。1945年前后，王士章参加了反动的三青团，同时也开始传播他的反动言论，污蔑并辱骂共产党和八路军，甚至主张消灭共产党。当然，在反动统治时期，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王士章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反地，对党对人民更加仇视，以至发展到狂妄而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右派分子王士章、楊思正都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逃兵。王士章于195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东北工作，但是他认为在这里不能发挥他的“才能”，竟不顾工作需要而擅自逃跑未成。但终于1952年辞职回到上海，并自动脱离了青年团的组织关系。楊思正是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但在以后的短短四年当中，曾先后两次借故回家，成

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党为了给予他们悔改的机会，后来重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并未作认真的检讨，从中接受教育，反而对党对政府不满，甚至变本加厉，散布反动言论，恩将仇报。

王士章、楊思正一向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自命是“馬列主义者”，自詡是“才华”之士，看不起任何人。因而他们从来不接受别人善意的劝告和帮助，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不但没有自我改造的自觉性，而是厌恶、拒绝思想改造，顽固地坚持着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反动思想，同馬列主义、同社会主义、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有机会就顽强地表现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倾洩一贯的反党仇恨，作全面的猖狂进攻，终于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右派面目。这就是王士章、楊思正墮落成右派分子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們知道，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是彼此呼应，沆瀣一气的。如果我们把全国各地右派的反动言论综合在一起，可以发现他们是一脉相承、语言共同和目标一致的。这种物以类聚的情况，当然是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都极力抨击、污蔑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则鼓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泛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所以，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由于这样，我们现在编写这本小册子，其意义就非常重要